

# 地方性文化的力量： 张謇教育思想与区域县中繁荣

丁百仁, 王毅杰

(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江苏南京 211100)

**摘要:**县中是县域教育的支柱和地方发展的希望所在,但近年来县中的师生与制度结构失去了比较优势,陷入困境。在建设教育强国的蓝图下,县中如何重整旗鼓?本文基于对全国知名县中聚集地——南通市的调查,借助强文化范式框架,探讨张謇教育思想何以成为一种与结构力量互补的地方文化力量助推县中发展。张謇教育思想在改革开放初的南通崛起叙事中被激活,锚定科教兴市的第一战略选择,使政府注意力优先分配于教育,从而塑造了县中的良好外部生态和主体积极实践,两者的适配进而带来区域县中繁荣。从文化社会学视角出发,将县中讨论转向地方性,揭示县中发展离不开由本土社会文化传统和资源产生的强大动力,这为其他地方教育振兴提供了启示。

**关键词:**县中繁荣;张謇教育思想;强文化范式;内外适配;文化共享

## The Influence of Local Culture: Examining Zhang Jian's Educational Thought and the Flourishing of County High Schools

DING Bairen, WANG Yiji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1100, Jiangsu, China)

**Abstract:** County high schools historically served as the backbone of local education systems and a beacon of hope for regional societal advancements. Yet, the once advantageous teacher-student dynamics and organizational frameworks of these institutions have deteriorated in recent years, precipitating a multifaceted crisis. In the context of national ambitions to forge a robust education system, the question arises: how can county high schools reassert their significance and vitality?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case of Nantong City, a hub renowned for its distinguished county high schools within China. It employs a "strong program" analytical lens to delve into the potential of Zhang Jian's educational thought as a catalyst for local cultural vitality, capable of synergistically interacting with structural forces to rejuvenate regional county high schools. Zhang Jian's educational thought was reignited during the early phases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underpinning the pivotal strategy of invigorating Nantong through a focus on science and education. This prioritization channeled governmental resources towards educational endeavors, thereby reforming the external ecosystem and internal practices of county high schools. Such strategic adaptations contributed to the sustained flourishing of these schools. Adopting a cultural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shifts the discourse surrounding county high schools towards a focus on their "placeness" — the unique social and cultural milieu they inhabit. By uncovering the foundational societal and cultural underpinnings that account for the developmental disparities among county high schools, the study illuminates how these institutions can harness potent, endogenous forces and resources to rejuvenate themselves,

providing a blueprint for the revival of county high schools.

**Keywords:** county high schools; Zhang Jian's educational thought; strong program; internal and external adaptation; cultural sharing

## 一、问题提出

“郡县治，天下安”，县域教育现代化关乎国家教育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县域教育，从完善学前教育服务到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再到加强县域普通高中建设。普通高中是县域“最高学府”，在国民教育体系中起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对上支撑高校人才培养，对下牵引义务教育发展<sup>[1]</sup>。目前，全国有普通高中1.42万所，其中县域普通高中0.72万所，占51%，在校生1468.4万人，占59%，构成整个高中教育的半壁江山。作为县域“最高学府”的龙头——县中是县内办学质量最好的普通高中，对县域教育起着引导和促进作用。“县中兴，则县域教育兴”<sup>[2]</sup>。舞好县中这个龙头，让县域的孩子享受优质教育，才能稳定和繁荣县域教育，提升我国教育整体水平。

县中是新中国高中教育史上国家要求办好重点中学的产物，其发展整体上经历辉煌、衰落和提升三个阶段<sup>[3]</sup>。历史地看，辉煌展现于20世纪90年代，一批县中在高考升学率和办学质量上领先，被冠以“县中现象”；衰落凸显于近十年，许多县中优秀教师流失、生源质量下降、重点高校升学率锐减，出现了“县中塌陷”；提升肇始于新时代，特别是2021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发布“县中提升计划”后，“县中塌陷”迎来系统性治理。对县中发展的研究与之相呼应，集中在21世纪的两个10年：一个是头10年，主要从制度主义（如“重点校”政策）的视角解读“县中现象”<sup>[4]</sup>；另一个是近10年，主要通过考察县中由盛转衰的过程来谋良策，如对“县中塌陷”“县中振兴”“县中高质量发展”的讨论<sup>[5-7]</sup>。

在曲折发展之外，亦有一些县中一路高歌，繁荣迹象不减，而这在以往横截面或短时段的县中研究中并不多见。正如有论者所言，2011年以来尽管我国总体上呈现“县中塌陷”态势，但区域间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部分区域的县中教育资源配置高于城区，尚未面临塌陷危机<sup>[8]</sup>。且相比而言，它们拥有丰富的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尤其是提前克服了其他区域县中已经或尚未碰到过的困境和难题，或能助力解决“县中塌陷”<sup>[9]</sup>，故在“县中提升计划”实施的今天，更

应成为需要关注的研究对象。

作为我国县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南通市下辖县中因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持续高位走强而被誉为“南通教育现象”<sup>[9]</sup>，属于县中繁荣序列。本文以此为代表性案例，考察在改革开放40余年历史进程中，该区域县中拥有怎样的繁荣图景？如何演化而来？其背后深层次的动因和逻辑机制是什么？考虑到区域县中与地方的关联，以及从外部视角去审视区域县中差异的局限，本文在地方性（placeness）<sup>[10]</sup>的启发下采用社会文化分析范式，将关注点转向市域内部，挖掘区域县中繁荣的本土资源。这对县中发展研究具有一定的学理价值，也对县中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二、文献回顾与分析视角

### （一）文献回顾：影响县中发展的因素类型

“县中繁荣”与“县中塌陷”是县中发展的一体两面，而近年来，伴随“县中塌陷”在部分省市的严峻性，其发展被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

县中发展与周遭社会是互构的。巴兰坦和海默克提出的开放系统模型（Open Systems Theory）也强调，教育组织是一个开放系统，和自身外部的环境相互作用<sup>[11]</sup>。借鉴该模型，将影响县中发展的因素归结为以下三类：第一类因素——输入，指涉生源和师资。生源和师资被视为县中最重要的两大资源，其好坏直接决定了县中发展水平，以至于在考察“县中塌陷”时，优质生源和师资的流失及其原因常处在分析的核心位置<sup>[6]</sup>。第二类因素——县中组织，包括它的结构与过程。作为县中的静态和动态成分，两者往往交织在一起，形塑学校内生动力。学校管理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也是关注焦点。研究表明，目标、制度、规范、课堂教学等有机结合形成的高效学校管理能够引导和激发全校师生的能动性，让县中焕发出蓬勃的生机<sup>[12]</sup>。第三类因素——环境，相比前两者，其重要性日益凸显。有论者指出，县中问题表面看是县中优质生源和师资流失带来的教育教学质量下滑，实质是关键的环境及变动所致<sup>[5]</sup>。

在环境分析中，已有研究主要沿着以城镇化为表

征的经济力、以教育制度变迁为表征的政治力和以阶层结构分化为表征的社会力来叙事。以城镇化为表征的经济力而言,一方面,城镇化导致的城乡差距加剧了教育资源失衡,与城区相比,县中教育资源供给较少、发展机会较差、教育质量也较低;另一方面,城镇化导致的人口流动在减少县中生源和师资的同时,也冲击了县中家、校、社育人共同体建设<sup>[3]</sup>。以教育制度变迁为表征的政治力而言,重点学校制度、跨区域“掐尖”招生政策及教育市场化改革是研究中心。其中,重点学校政策是历史诱因,它不仅带来重点与非重点高中的分化,还以各种潜在途径和历史影响在教育实践领域以不同方式竞相出场,如重点高中出现由县一级迅速向省市一级聚集<sup>[13]</sup>;跨区域“掐尖”招生政策是现实动因,由于招生范围的变化,县中优秀生源外流,严重挫伤了办学信心<sup>[14]</sup>;教育市场化改革是一味催化剂,民办高中、学区房和择校等加速跨区域招生,参与县域优质生源和师资争夺,破坏了教育生态<sup>[15]</sup>。以阶层结构分化为表征的社会力而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巨变,最主要表现是阶层结构分化日益凸显,优势阶层在社会转型中获利更多,教育不平等随之加剧。优势阶层子女可以通过择校等享受优质教育,中等教育的分层进一步延伸为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差异,由此带来县中发展的结构困境<sup>[6]</sup>。

## (二)分析视角:地方性文化与县中发展

综上,既有研究对开放系统模型中的各类因素均涉及,但侧重显性的结构力量,而对隐性的文化力量着墨不多,且局限在学生家庭和学校两大场域。前者主要从学生家庭的文化资本及其行动选择剖析他们如何抛弃县中。有研究指出,家长是子女教育的积极行动者,高文化资本的家长对子女教育期望更高,也更多参与教育,尤其在“县中塌陷”时把子女送入城区重点中学<sup>[13,16]</sup>。后者主要从学校的知识能力和组织文化及其教育效应剖析县中如何失去家长和学生。有研究指出,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县中处在市域高中教育改革的边缘,相对欠缺教育活力与改进意愿,呈现“知识贫困”特征,难以让家长和学生满意<sup>[7]</sup>。

“教育有如一条大河,而文化就是河的源头和不断注入河中的活水,研究教育,不研究文化,就只知道这条河的表面形态,摸不着它的本质特征。”<sup>[17]</sup>文化是存在于各种内隐和外显的模式中,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和传播,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物品的各种具体式样<sup>[18]</sup>。一方面,从

文化的分析层次来看,它包含微观、中观和宏观文化,其中微观文化有家庭、学校与社区文化,中观文化有地方性文化,宏观文化有国家文化等。已有研究聚焦在微观领域,而本案例的分析单位是南通市,并非下辖县(区)的个别县中,要了解该区域县中发展就要了解所处的地方性文化<sup>[19]</sup>。另一方面,对文化的分析经历了从弱文化范式到强文化范式的转向。21世纪初,亚历山大在《社会生活的意义》中提出强文化范式(Strong Program),让文化由边缘到相对自主再走向独立<sup>[20]</sup>。它是一种积极推动文化与结构脱钩,阐明文化在塑造社会生活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的学术思潮,其唯一且主要特征是认可文化自主性,而弱文化范式(Weak Program)将文化附属在结构中作为一种模棱两可的非独立变量,只认可文化相对自主性<sup>[21]</sup>。已有研究局限在弱文化范式,而本案例的地方性文化特色鲜明,尤其是近代张謇教育思想,成为南通人的文化基因<sup>[22]</sup>,能够为个体行动和社会现象输入诸如经济、政治力量一样的勃勃生机<sup>[23]</sup>。这为从强文化范式出发,考察地方性文化与县中发展的关系提供了契机。

本案例的研究资料主要通过以下两种途径获得:一是实地调查,我们于2023年3月到8月多次到南通,对市、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和高中学校工作人员进行访谈,了解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发展历程,透视不同利益相关主体的态度与行为;二是文献检索,包括地方志、年鉴资料以及政策文本等。

## 三、南通模式:县中发展的“模范”

教育的文化研究特别重视教育现象发展的来龙去脉<sup>[19]</sup>。南通的县中繁荣与1977年高考恢复关联在一起。那时,与全国绝大多数地区一样,南通各县流行“县中模式”。1983年,启东中学5名学子在全国数学联赛中获奖的事迹引起轰动,启东中学以奥赛为突破口使其迅速脱颖而出。接着,南通下辖县中创新争先,在20世纪90年代已声名鹊起。进入21世纪,它们伴随经济腾飞而大放异彩,展示出县中发展的南通模式<sup>[9]</sup>。

同为市域高中教育的“翘楚”,与衡水模式等的备受争议相比,南通模式却广受赞誉与推崇。2023年高考前后,《江苏教育报》和《中国教育报》分别刊发《人民满意的“好高中”——南通县域普通高中群峰现象观察》和《办人民满意的好高中——江苏南通推进县域普通高中高质量发展记》,对其大加褒扬。各地也掀起了学习南通模式的热潮。2023年3月,浙江省湖

州市开展全市“学南通 争先进”普高提质行动。

那么,南通模式究竟有何亮点,能够成为县中发展的“模范”?首先,放眼市外——优质是南通县中的长期表现。高考制度是我国基础教育的指挥棒,高考作为衡量高中教育水平最为系统和客观的标准化测试,考生所获得的高考成绩和大学录取率可以反映当地教育质量。自20世纪90年代,南通高考成绩开始领跑全省,2018年以来,全市普通高考本科达线率超过92%,其中,一本达线率超过50%(全省不到30%)。且相比全市平均水平,各县中在一本达线率、高分段占比、清北录取人数、省(市)状元等方面十分出彩。以2020年为例,各县中一本达线率均超过90%;高分段400分以上(总分480分)706人,位居全省第一,其中县中占81.16%;清北录取26人(不含强基计划),位居全省第三,其中县中23人;市文科状元均在县中,仅比省文科状元少4分、5分。

其次,环顾市内——均衡是南通县中的最大亮点。高中不属于义务教育,各地的比拼带来了省、市、县域中学的梯级差序和内部分化<sup>[3]</sup>。与之不同:第一,南通高中教育呈现县中强于市中的特殊现象。以2020年一本率、高分段和清北录取人数三项高考指标为例,市中仅在7所学校(市、县、区高中)中排第五。第二,县中呈现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表1显示,无论是从入口端的生源基础,还是从出口端的生源表现来看,各县中整体强劲,是高中教育均衡化的代表。第三,县中均衡的独特性在于,它们不单以个体自身,更以集团形象呈现。大部分县中与辖区内的一所薄弱校结成高中教育联盟,因此,当地政府和百姓也常以帮扶校办学水平来反观县中。以启东中学-启东市东南中学和海门中学-海门市证大中学为例,从入口端的生源变化来看,2022年启东市东南中学和海门市中学证大中学的高中录取分数线分别为629.5、633.5(2020年分别为597.5、606),二者的领衔学校也相当。

表1 2020年南通县(市、区)中的教育均衡指数分布

|                  | 南通<br>中学 | 通州<br>中学 | 海门<br>中学 | 海安<br>中学 | 如皋<br>中学 | 如东<br>中学 | 启东<br>中学 |
|------------------|----------|----------|----------|----------|----------|----------|----------|
| <b>入口端</b>       |          |          |          |          |          |          |          |
| 录取分数线            | 684      | 672.50   | 682.50   | 682      | 686      | 668      | 670.50   |
| <b>出口端</b>       |          |          |          |          |          |          |          |
| 一本达线率            | 94.53%   | 94.50%   | 96.10%   | 95.00%   | 98.74%   | 95.60%   | 90.10%   |
| 高分人数<br>(400分以上) | 75       | 71       | 133      | 131      | 101      | 92       | 45       |
| 清北人数<br>(含强基计划)  | 4        | 9        | 10       | 9        | 2        | 2        | 2        |

注:(1)1983年南通实行市管县体制,管辖海安、如皋、如东、通州、海门、启东6县;(2)资料来自南通市(区、县)教育考试院和“南通教育”官方公众号。

最后,纵观自身——特色是南通县中的转型成果。受1977年高考恢复和标准化考试影响,绝大多数县中把高考成绩作为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目标,学校一切围绕高考而展开,催生了中国独特的“县中模式”。南通亦如此,辅之以奥赛实现超越,并因成绩斐然而挑战省会的高中教育<sup>[24]</sup>。近年来,它们随高考改革不断调整,以高品质为追求,以新课改为路径,朝优质特色发展,且已初显成效:3所县(市)中入选“省高品质示范高中首批建设立项学校名单(共20所)”。这是江苏省普通高中教育在原有星级评估基础上创设的引领性发展项目,是顺应高中教育改革趋势、助推高中教育品质提升的重要工程。

#### 四、张謇教育思想与南通模式及转型

改革开放40余年来,南通模式克服了县中发展的痛点和难点,谱写出“优质、均衡和特色”的盛景,不仅与全国整体,甚至与许多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仿的局部地区都形成鲜明对比,其背后原因令人深思。

教育与文化关系密切,受文化的影响比受经济、政治的影响要深刻得多,久远得多<sup>[17]</sup>。而且,“当面对相同的发展条件,却有差异的发展结果(如一些人或地区富裕,另一些人或地区贫困)时,文化解释亦颇为得道。”<sup>[25]</sup>尽管南通模式是一个系统性发展的过程,涉及区位、政策、经济等方面,但文化力量尤其是张謇教育思想不容忽视。张圣华、缪志聪指出:“南通,具有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张謇‘父教育、母实业’的教育理念,一直是南通地方发展的力量源泉。”<sup>[9]</sup>

借助强文化范式框架,沿着“文化自主性—文化深描—文化影响”的进路<sup>[20]</sup>,本研究将在阐释张謇教育思想的基础上,揭示其与南通模式形成及转型的关系。

##### (一)文化深描:“双重经验”与张謇教育思想

南通崇教文化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运动过程。近代教育家张謇是重要传承和创新者,因而张謇教育思想是个人性的,更是地方性的<sup>[26]</sup>。张謇出生在南通海门常乐镇,1894年高中状元后的他有着“双重经验”:一是1895年中日战争及此前鸦片战争之辱的东方经验;二是1903年前往日本进行为期70天考察的西方经验,促使其观念和行为转变,“崛起于新旧两界限之中心”。进而,张謇在家乡建设实践中形成以“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最早表述在《师范学校开校演说》,“益见实业、教育二事,有至亲至密之关系”,正式提出于《通海中学附国文专修科述

义并简章》,“国所与立,以民为天;民之生存,天于衣食;衣食之原,父教育而母实业”,把实业与教育的关系比喻为家中的父母,至亲至密,即“实业教育”<sup>[27]</sup>。

站在民族复兴高度,张謇教育思想回答了“教育之问”,也就是教育为何、教育是何及教育何为。首先,教育为何指向“公共性”原则。张謇将教育由“学而优则仕”的私域升至公域:“实业教育,富强之大本也。教育所以开民智。顾念今日,岂唯民智不开而已。”强调教育优先发展的同时也应实现普惠(均衡):“况图国家强立之基,肇国民普及之教育乎?”其次,教育是何指向“育人性”原则。张謇提倡让教育回归本质,明确“国家思想、实业知识、武备精神三者,为教育之大纲”,尔后进一步阐释为“谋体育德育智育之本,基于蒙养”,强调教育培养“健全之国民”。最后,教育何为指向“规律性”原则。张謇认为办教育是一件很专业的事情,表现在教育系统外,应契合地方发展逻辑,“顾学必期于用,用必适于地”;在教育系统内,应契合自身发展逻辑,从宏观办学体系构思,如“师范启其塞,小学导其源,中学正其流,专门别其派,大学会其归”,到微观办学实践主张,如“教授主自得,管理尚严格”等,强调教育的适切原理。

张謇教育思想内容庞杂且散见于日记、书信、演讲及私塾规章等,但统合为一个主题:“教育兴业”(即“父教育而母实业”)。正如章开沅所述,“他在40岁以后,外来侵略的强烈刺激与西方文化的浸润潜移,促使经世致用的学问增添了‘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新内容……没有刀光剑影的惊险,没有叱咤风云的雄武,然而却是脚踏实地改变着中国社会的根基,其影响甚至在百年以后也可以看见。”<sup>[28]</sup>

## (二)文化影响:张謇教育思想与南通模式的形成

面对文化影响的问题,强文化范式并非暧昧不清,也不将抽象的系统逻辑视为一个具有因果关系的过程,而是试图直接在行动者与制度(机构)之间建立因果关系,并阐明文化如何介入乃至引导实际发生的事,即“文化是母亲,制度是母亲的孩子”,文化发挥作用的重要中介是“制度”<sup>[20]</sup>。以“优质均衡”为基础的南通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已初现雏形,且十余来年迈向“特色发展”,而这都受到张謇教育思想的影响。这也就需要探讨张謇教育思想如何经由制度中介形塑良好教育生态和主体积极实践,进而实现区域县中繁荣。

### 1. 情境参照、文化激活与“科教兴市”为先

南通模式的核心是辖区县中繁荣,这一景象是在

改革开放以来的科教兴市进程中达成的。程亚民在《南通市志》首发式上也指出,“科教兴市、以港兴城,使南通逐步发展成港口、工业、贸易、旅游城市,成为世界冠军的摇篮、教育强市、建筑之乡”。作为关键制度环境——科教兴市与张謇教育思想有着怎样渊源,赋予其什么意涵,又将其引向何方?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方针后,恢复和发展经济是各地工作重心。南通虽然经济总量不错,1979年全市GDP达31亿(同年度苏州33亿),但农业“人多地少”,工业“两头在外”,原材料和市场必须走到外面去,且当时江阻海隔,是出了名的“难通”,增长后劲不足,与周边地市尤其是苏州的前进速度和差距逐渐显现出来,1982年南通GDP仅为37亿(同年度苏州53亿)。1983年,实行“市管县体制”的南通如何确定符合自身实际的新发展战略已迫切地摆在市领导集体面前。

历史何曾相似,张謇弃官回乡时的南通同样面临交通不畅,土地贫瘠,工农业不发达。而他躬行“实业救国、教育兴邦”之策,短短20年便使偏于江海一隅的落后县城迅速腾飞,一跃成为现代化水平最高的中小城市,不仅赢得了“全国模范县”和“中国近代第一城”,还转化为一种地方社会文化传统。从那时起,崇文重教,成为南通人的文化基因,也是南通市的精神底色<sup>[22]</sup>。无论是在南通政府,还是在民众心中,教育都占据很重的分量。当地流行这么一句话:“教育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怎么投入都不算多,再穷也不能穷教育。”

再加上改革开放初期“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的国家提倡,近代张謇在南通更受政府和民众推崇,并深刻地影响市领导集体的新发展战略选择。20世纪80年代,南通提出“外向开拓、科教兴市”两翼齐飞战略,赓续张謇“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的区域发展模式,“实业战”“教育战”并重。到了90年代,进一步明确为“科教兴市,外向带动,以港兴城,共同发展”战略,把科教兴市摆在首要位置,并于1995年荣获“科教兴市先进市”。进入21世纪,南通继续秉承优良传统,弘扬先贤伟业。从世纪之初的“科教兴市、以港兴城、经济国际化、城市化”战略到新时代以来的“科教兴市、人才强市、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突出了科教兴市的第一战略。

从最初提出到如今,科教兴市因张謇教育思想而在南通有着很好的文化传统和根基,被视为富强之大本,一直在地方发展战略和规划中位于最前列。南通

市《政府工作报告》多次强调,要“始终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加快富民强市进程……必须找准加快发展的着力点,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市’战略。”

## 2. 内外适配与“启中现象”:南通模式的引领者

按照巴兰坦的系统分析法,南通模式作为一种区域县中现象嵌入于所处教育生态。教育生态是教育主体生存发展的环境及其伴随的状态,是由教育制度(国家)、教育文化(社会)、教育期望(家庭)等诸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是教育风气的综合反映<sup>[29]</sup>。近代张謇“父教育而母实业”的理念深入人心,在改革崛起叙事中,促成南通市领导集体锚定“科教兴市”战略,不仅以更大决心支持教育,还将更多注意力分配给教育,形成“城市发展,教育先行”的良好风气。

因之,全市上下戮力同心凝聚起大抓教育的强大共识。对于政府而言,坚持政以教为先,勇当良好教育生态的第一责任人,其受张謇教育思想尤其是“公共性”原则的影响,在方向引领、制度设置和资源保障方面下功夫,形成独特的市域教育生态<sup>[30]</sup>。自20世纪80年代,南通以高质量办人民满意教育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建设教育强市,锻造“教育之乡”品牌。围绕这一目标,市委、市政府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灵活政策制度保障:首先,灵活人事政策,允许市教育局按照“选拔调用”的方式在全市遴选机关工作人员、市直单位校长和管理人员,保证“教育家办学”。其次,实施生源保护政策,高中教育阶段严禁跨区(县)招生,义务教育阶段严格按施教区招生,同时严把县中学生“出入关”。再次,创新师资保障制度,从师范院校提前招生到五年一贯制师范教育,再到七年贯通定向培养项目,南通在培育教师的同时还规范教师跨区域流动,并整合资源设立市级教师编制“周转池”等。最后,强化教学质量,主要通过在全市搭建广泛、多层次、成体系的教科研平台以及学科建设基地来提升教育水平。此外,在财政经费上也给予优先落实,改革开放初南通教育事业费就占财政支出的25%,远高于同期的南京(8%),而生均公用经费全部达到或高于省定标准。对于民众而言,秉持民以教为荣,甘当良好教育生态的维护者和建设者。社会上尊师重教氛围浓厚,涌现出一批又一批捐资助学不留名的“莫文隋”群体,且每个家庭对子女教育特别重视,“宁毁家,不可废学”在观念和行为上广为接受。

在良好外部生态下,南通模式既非自然生成,亦非一蹴而就,经历了从头狼引领到群狼共舞的过程。启东中学(以下简称启中)扮演着头狼角色,其在20世

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崭露头角,90年代已经声名远扬:“全国教育看江苏,江苏教育看南通,南通教育看启东,启东教育看启中。”

如果说启中的先行受惠于启东人“开疆拓土、敢为人先”的精神底蕴,以及启东紧邻港口和上海的经济优势,那么启中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张謇教育思想。从外部来看,20世纪80年代初,市政府对张謇教育思想(特别是“公共性”原则)及触发的“科教兴市”第一发展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在启东县得到贯彻落实,启东县主要领导高度评价县中教育对启东经济腾飞的贡献,并作出“千方百计把启东中学办得更好”的重要指示。“全县教育一盘棋,为启东中学保驾护航”,启东县政府给予启中全县择优招生(2005年又提前招生)、全县选拔调用优秀教师、加大教育财政投入等政策倾斜。从内部来看,校长是学校的领航人。就读于南通师专的启中原校长王生深受张謇教育思想熏陶与浸润,并在启中身体力行。受教育的“规律性”原则特别是“学必期于用,用必适于地”这一办学理念引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结合启中的校情、学情自主钻研数学竞赛项目,所带班级在高考中首战成名——数学平均成绩全省第一,且5个学生参加全国数学联赛获得一、二等奖。后来,在邻县王庆根通过获得国际化学奥赛金牌免试就读南京大学的刺激下,他进一步主推“奥赛+高考”两条腿走路方针。

由张謇教育思想形塑的市、县良好外部生态支撑了启中探索式发展,尤其是创设高中实验班所需的优质生源、优秀教师、政府投入及社会支持等,内外的有效适配促成“奥赛金牌模式”。1995年,启中勇夺第26届IBO金牌;1996年高考,首届实验班再续佳绩,4人考取清北。随后不断输出国际奥赛之星,且奥赛精神激励的高考也连年创新高,被誉为神奇的“启中现象”,成为南通模式的创新驱动者和引领者。

## 3. 文化共享、涟漪效应与南通模式的形成

“启中现象”在不断自我强化,同时在文化共享的过程中不断外溢。文化共享是不同人群对单一或多个文化的认同现象,在人们的认知、价值、体验、实践等活动层面均有表现<sup>[31]</sup>。因缔造“中国近代第一城”的贡献,以“父教育而母实业”为核心的张謇教育思想,在南通有着深厚的文化和社会底蕴。由于改革开放初市委、市政府的重新关注、挖掘和运用,特别是2000年以来的大力宣传,如纪念张謇诞辰150周年大会、“百年苑庆”活动、市(区、县)张謇研究会等,推动其从市级到县(区)级政府部门,再到寻常百姓家,迅

速得到普及和认可,已成为南通的文化符号和骄傲。

文以化人。共享张謇教育思想首先提升了南通人对教育的社会认知度和社会价值高度。张謇曾言:“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中国今日国势衰弱极矣,国望亏损极矣……诸君以为可耻否乎!欲雪其耻,而不讲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与。”<sup>[27]</sup>教育是家国事,与家国命运联系在一起,使南通人树立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并引起他们的特别关心和支持。几十年来,当地社会流行一种有趣的现象:与他在单位谈事、在家里聊天、在饭店聚餐……甚至在排队购物时,总是谈着谈着就谈到教育,越谈越投机,毫无停止的迹象。

在形塑民情的同时,共享张謇教育思想也带来了南通市政府尤其是所辖县(区)政府“教育优先发展”的行动。发展是第一要务,“求活之法,唯有实业、教育”,然“教育为实业之母”“有实业而无教育,则业不昌”<sup>[27]</sup>。20世纪80年代中期,市主要领导将教育作为头号工程。1985年时任南通市市长张佑才强调:“各县(区)、主管部门,要把发展教育事业作为自己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上级对下级的检查和考核,要把是否重视教育作为一个重要内容。”<sup>[32]</sup>处处强调、层层传达、久久为功,拓至辖区所有政府部门。“市级领导同志对教育是人人关心,个个支持……市里领导做出了样子,带动了县(区),县(区)几套班子成员也是人人重视教育。”正如时任海安县县长卢玉林所言,“以前我是一跑猪场,二跑工厂,就是不跑学堂,现在要重视教育,先跑学堂,再跑猪场、工厂。”<sup>[33]</sup>

县中是县域教育窗口,而共享张謇教育思想下南通老百姓的美好教育期待、市县政府的高度重视教育强化了它们的使命担当。启中原校长唐玉英指出,校长和老师都把高考视为荣誉,带的学生没考好,觉得对不起家长、学校和政府。再加上,市、县政府的良性引导,“南通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每半年召开一次各县(区)长会议,总结上半年的教育工作,布置下半年的任务,重点研讨教育方面的问题……哪里有新经验,会就在哪里开”<sup>[33]</sup>。这进一步增强了各个县中的行动自觉。

作为办学奇迹的“启中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初已声名远扬,与黄冈中学一起构成我国中学教育的“双子星”。它打破了南通教育的宁静,给同处张謇教

育思想熏陶的其他县中带来了压力,同时又充当了“头狼”(新经验),促使它们心慕手追,产生广泛的涟漪效应。新世纪初,南通6所县(市)中的教育质量已大幅提高,彼此差距也在不断缩小。从以往靠后的如东县来看,“自恢复高考到上世纪90年代初,由于生活水平低下,教育资源匮乏,如东的教育质量一直处于低位发展阶段,高考总体水平在全省、全市还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如何保障教育‘脱贫’成了当时迫在眉睫的事情。”“面对这一现状,如东教育人东学启东,西学海安……”“此后,如东的高考水平一直保持高位增长,并于2004年达到顶峰。”<sup>[34]</sup>(鼎峰应为顶峰,编者注)

### (三)南通模式的转型与发展:再论张謇教育思想传承

张謇指出:“教育必须与时势相消息,倘未与时势变迁,墨守定章,一成不变,则教育与时势不相应,虽有成效,何补于国,何补于民?”<sup>[27]</sup>南通模式深嵌于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环境尤其是高考制度环境。1977年高考恢复后,国家引入标准化考试,使基础教育尤其是高中不得不跟着应试教育走,“育分”成为学校发展的核心要义。进入21世纪,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唯分数的单一评价不符合经济社会需要和人才培养目标,我国逐步扭转片面的应试教育,推动以多元评价为导向的素质教育改革。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加强对学生能力和素质的考查,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内容,探索多次机会、双向选择、综合评价的考试、选拔方式”,陆续走向新高考,指挥着高中教育由见分不见人到见分更见人<sup>[35]</sup>。

在此进程中,作为应试教育代表——南通模式的内在弊端越发凸显。尽管20世纪90年代初江苏(南通)已推进素质教育,但主要集中于小学和初中阶段,其在高中的规模、范围与成效较小。犹如时任启中学校长王生所言,“首抓应试教育,兼顾素质教育”,而这在我国综合素质评价政策演进过程中越来越不合时宜,逐步在2008年开启的新高考模式下显现出来。从引领南通模式的“启中现象”来看,启中2012年开始出现下滑的征兆,当年竟未向家长公布高考成绩,再度发布的2015年也无昔日辉煌:本科上线率降至92.1%,一本上线率变成“创历史新高”的模糊表述,清北上线人数回落至个位数。

新时势下的高考危机引发当地教育人深刻省思,也掀起高中阶段的素质教育改革浪潮,而张謇教育思

想(特别是“育人性”“规律性”原则)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它不仅以个体性方式为部分县中提供了文化资源,如海门中学的“张謇文化传承省级课程基地”,更以普遍性方式影响了全市县中的转型实践:首先,定位高。南通县中素质教育尤为强调“大德”——国家和民族情怀,传承张謇教育兴邦理念,“环顾五洲,彼所称强大文明之国,犹是人也”,将育人与国家自强联系起来。其次,内容广。“谋体育德育智育之本,基于蒙养”,南通县中在智育之外,尤为强调德育和体育,并参考张謇的“国家思想、实业知识、武备精神三者,为教育之大纲”,形成了以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和体教结合为底色的素质教育格局。最后,模式新。教育是“有方而无方,有法而无法之事”,故“教授主自得”,教师要“因材施教,毋拂毋悖,毋萌倦志”。受张謇教育思想之规律性引领,南通县中实施素质教育注重挖掘学生在高素质下的个性特长,将高考与竞赛、才艺、体育等有机结合。

总之,在张謇教育思想影响下,南通县中素质教育转型初见成效,形成了鲜明的区域特色,同时也实现了在德智体高水平上的高升学率。回首启中,2018年以来学校一本上线率超过85%,二本上线率几近100%,其中,2020年一本上线率升至90.10%,且同年度其他6所(市)县中一本上线率也超过90%,与新世纪初省会南京实施的素质教育形成鲜明对比<sup>[24]</sup>。全新的南通模式在新高考模式下继续绽放光芒。

## 五、结论与讨论

县中振兴是“十四五”时期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事关县域基础教育的兴旺发达,对乡村振兴和县域经济社会发展起关键支撑作用。近十年来,尽管我国县中发展总体上显著滞后于市(省)中,成为高中教育的短板,但其分化程度也在不断扩大,区域之间和内部差距明显:有些区域县中出现“塌陷”,严重掣肘了基础教育事业“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发展,引起学界的广泛讨论;而有些区域县中呈现“繁荣”,赢得了当地政府和老百姓的赞誉,却关注较少。本文以区域县中繁荣的代表——南通市为案例,从社会文化范式出发,揭示了县中发展的地方性条件和基础,特别是区域文化与县中发展的关联,以期为县中振兴提供新思路。

改革开放以来的县中发展史表明,南通模式是一个“成功样本”,其下辖县中不仅在20世纪80、90年代的应试教育中脱颖而出,而且在新世纪初的素质教育转型中实现德智体高水平上的高升学率,形成了“优

质、均衡、特色”的高质量发展内涵。同时,南通模式是一个系统推进的过程,是自身与外部环境持续互动的产物,而张謇教育思想作为近代南通的地方文化传统和资源,影响甚大,以至于今者常言“南通如今的教育地位要感谢教育家张謇”。

从南通模式来看,张謇教育思想虽然底蕴深厚,但它不会自动转化为区域县中繁荣的关键文化力。首先,外部因素激活是它得以施加影响的前提。改革开放初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抓经济、抓发展成为各级政府的第一要务,而因“中国近代第一城”的历史参照,使当时发展后劲不足的南通寻古问今,以“父教育而母实业”(教育兴业)为特征的张謇教育思想被关注、挖掘和运用。其次,良好外部生态与县中积极实践是关键中介项。张謇教育思想塑造并突出了“科教兴市”的第一战略,营造出良好教育生态,同时也在敢为人先的启东地区影响了启中战略选择,二者的适配带来“启中现象”,并作为创新驱动者和引领者在文化共享过程中引发广泛的涟漪效应,促成南通模式。最后,张謇教育思想的影响是深层而长远的。它不仅形塑了南通模式,还在后续的南通模式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其本身成为可调用的优秀文化资源;另一方面,其(特别是“育人性”“规律性”原则)引导着转型的方向和路径。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在强文化范式下突出了张謇教育思想的文化客观性、自主性和影响性(支配性),而文化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往往与结构相生相伴,二者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就南通而言,张謇教育思想作用于南通模式建立在一系列制度、政策、财政等结构的大力支持上。相反,在许多结构条件不错的地区却面临县中“塌陷”,未能将结构优势转化为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其中的影响因素众多,而能否具备或激活诸如张謇教育思想一般的重教文化传统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跳出南通模式,张謇教育思想仍可以为其他地区的县中振兴提供现实参考和借鉴:一方面,它虽然是一种典型的地方性文化,但是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其中相当一部分文化要素已演变成全国性文化,如“公共性”原则下的教育优先发展、实业(经济)与教育关联、国民教育普及等,直接服务于当地教育事业;另一方面,地方性文化反映了不同区域人们在适应环境时的智慧和资源,它启示我们,与显性的结构关怀一样,应充分意识和挖掘地域文化因素的价值和作用,且后者往往相对隐匿而更容易忽视。

## 参考文献

- [1]陈先哲,曾晓,靳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县中变迁的深层机理探析——基于资源依赖理论的解释[J].教育发展研究,2023,43(2):11-19.
- [2]张志勇.国家教育治理视野下的县中教育振兴路径[J].教育学报,2022,18(5):72-83.
- [3]雷望红.我国县中发展的运行逻辑与振兴道路[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21,20(6):14-21.
- [4]韩晓光.城市学生就读县中现象分析[J].教育发展研究,2007,29(8):69-72.
- [5]林小英.县中的孩子:中国县域教育生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1-24.
- [6]谢爱磊,白宜凡,李家新,等.县域高中的学校阶层分割与学生的高等教育期待——基于粤东西北“县中塌陷”问题的调查[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22,20(4):52-74.
- [7]王坤.从知识贫困中突围:论县域普通高中的塌陷与振兴[J].中国教育学刊,2022(2):1-7.
- [8]汪栋,王子威,殷宗贤.县中塌陷的区域异质性、成因与政策治理路径擘画[J].教育发展研究,2023,43(2):20-27.
- [9]张圣华,缪志聪.人民满意的“好高中”——南通县域普通高中群峰现象观察[N].江苏教育报,2023-06-02(36).
- [10]王春光.地方性与县域现代化实践——基于对太仓与晋江持续近三十年的调查[J].社会学研究,2023,38(3):1-22.[万方]
- [11]巴兰坦,海默克.教育社会学——系统的分析[M].熊耕,王春玲,王乃磊,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3-16.
- [12]王守田.甘肃秦安二中:精细化管理让弱势县中拼出新天地[J].中小学管理,2022(2):34-36.
- [13]刘丽群,张文婷.振兴县中:何以必要及如何可能[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21,20(6):8-13.
- [14]周秀平,杨玉春.县中振兴中的跨区域中考招生治理[J].教育学报,2022,18(5):84-94.
- [15]汪栋,董佳,陈鸣声.取消择校费是否缩小了市县间普通高中教育财政投入差异? [J].复旦教育论坛,2023,21(2):55-63.
- [16]王毅杰,丁百仁.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实践及其治理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
- [17]顾明远.中国教育文化基础[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1-38.
- [18]KROEBER A L, KLUCKHORN C. Culture,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M]. Milwood, N.Y.: Kraus Reprint, 1978:145-193.
- [19]顾明远.教育的文化研究[J].中国教育科学,2013(2):3-15.
- [20]ALEXANDER J C. The meanings of social life a cultural sociology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21]CORDERO R, CARBALLO F, OSSANDÓN J. Performing cultural sociology: a conversation with Jeffrey Alexander[J].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2008, 11(4): 523-542.
- [22]吴良镛.张謇与南通“中国近代第一城”[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 [23]SEWELL W H. A theory of structure: duality, agency, and transformation[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2, 98(1):1-29.
- [24]于英杰.追问南京“高考之痛”[J].教育发展研究,2004,24(10):75.
- [25]周怡.贫困研究:结构解释与文化解释的对垒[J].社会科学研究,2002,17(3):49-63.
- [26]孙模.南通千年古教育:“教育之乡”的利市源头[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21:1-3.
- [27]《张謇全集》编纂委员会.张謇全集[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 [28]章开沅.张謇传[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1:1-3.
- [29]刘秀峰.论我国良好教育生态构建的提出、内涵与路径[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9(2):116-125.
- [30]赵海龙,郝浩亮.南通教育对我们的启示(2):探寻南通教育领先的“秘诀”[EB/OL].(2021-04-06)[2023-11-12].<https://www.ishaanxi.com/c/2021/0406/2022857.shtml>.
- [31]秦红增,陈子华.遗存、遗产与续用发展:关于文化共享的整体分析[J].东南学术,2020(3):105-114,246.
- [32]张佑才.改革教育体制 振兴南通教育事业[M/OL].南通市教育局长.南通市教育志.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505-512[2023-11-12].<http://static.ntsyz.gov.cn/pdfs/web/viewer.html?file=http%3A%2F%2Fstatic.ntsyz.gov.cn%2Fupfile%2F2018%2F08%2F1533698010651.pdf>.
- [33]博通坊.“南通教育要闯出自己的路子来!”——记与南通市教育局长李炎同志的一席谈话[J].江苏教育,1991(6):6-8.
- [34]俞慧娟,徐悦箫.40年,如东高考入学率翻了20多倍[N].如东日报,2018-10-24.
- [35]陆一.强才智与强素质:素质教育改革新认识[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0(12):76-89.

收稿日期:2023-12-14

基金项目:2022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教育‘双减’政策下的家庭策略与优化路径研究”(22CSH087)

作者简介:丁百仁,1989年生,男,社会学博士,河海大学社会学系讲师,主要从事城乡社会学、教育社会学、流动人口等领域的研究;王毅杰,1973年生,男,社会学博士,河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流动人口、农村社会变迁、组织与制度分析、社会研究方法等领域的研究。